

前美国国防部长

温伯格回忆录

为和平而战

封长虹 译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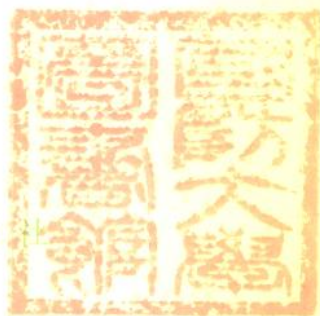
前美国国防部长

温伯格回忆录

为和平而战

封长虹 译

新华出版社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

Caspar W. Weinberger

First Printing, May 1990

A 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

U.S.A

根据美国沃纳出版公司1990年5月第1版译出

前美国国防部长

温伯格回忆录

为 和 平 而 战

封长虹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3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插页4张 250,000字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11—0906—0/K·125 定价：5.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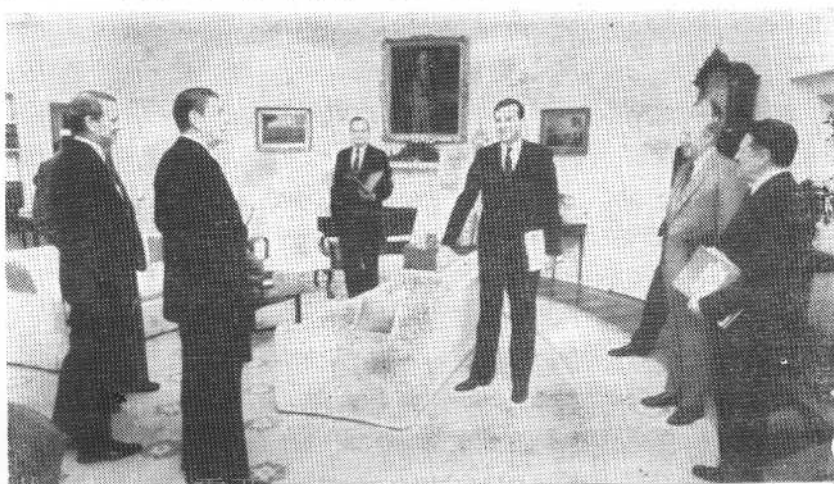


1981年1月6日，卡斯帕·温伯格作为当选总统选中的国防部长，在参议院三军委员会听证会之前。



1981年9月1日，与联邦预算及管理局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向总统汇报国防预算问题。

1983年5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根（左二）、乔治·布什副总统（左三）、国家安全顾问比尔·克拉克（中）、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右二）、作者（右一）。





1985年11月8日温伯格在加利福尼亚某要塞观看军事训练。



1983年11月7日温伯格陪同里根总统在白宫接受从格林纳达回来的学生的谢意。



国务卿舒尔茨（左）、里根总统及作者（右）于1985年4月15日在内阁会议室。



1987年11月18日在辞职仪式上接受里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

译者前言

本书系前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W·温伯格对其在美国国防部任职七年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回忆，表现出美国政府在这七年中对重大国际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政策及这些政策的制定情况，显示了美国政府在這些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也显示了作者本人在这些事务中所持的观点和态度。

全书共十三章，主要内容包括卡特政府与里根政府之间的过渡、暗杀里根总统的企图、美国在格林纳达等国问题上的立场、美日防务关系、美中关系、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中导条约、伊朗和人质问题，以及美国在波斯湾的行动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温伯格当时是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人和政策执行者之一。所以，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供研究美国和国际问题的同志们参考。

温伯格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和平，而为了维持和平，必须具有强大的维持和平的力量，即主张强权政治，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直至使用武力。他是从美国统治阶级的立场来分析当前的世界事务，从美国的自身利益来看待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问题的，其反共立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相信读者会对此书内容采取应有的分析批判态度的。

1990年8月18日于北京

作者序

“特此成立国防部，以作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规定，将陆军部、海军部及空军部合为一体，“由此，国防部长为其负责人”。

我从1981年1月20日开始就任国防部长，直到1987年11月23日为止。这里，我打算记述的正是这些年中所发生的一些主要的安全与国防问题、重大事件及活动。

当然，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了，其中有些是出自那些曾在里根总统政府中任过职但却不负责国防事务的人。大部分的其他叙述，如出现在日报和期刊上的文章，则是由那些在所写的问题上当时并无资格在场或并未亲身涉入的人写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把这近七年的事件的历史及其来龙去脉写出来，因为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亲身历践的事情。

在我看来，这样做对我来说是恰当的，并且，这的确是我的义务。因为，我享有了成为这段历史的一小部分的特权。正如一个读过和学过大量历史的人一样，我总喜欢阅读那些作者本身参加过其中一些重大事件的著述。在我看来，一些个人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有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危机》、迪安·艾奇逊

的《参与创造世界》及八卷本的《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总是比其他的显得更加生动。不管事件参与者是否作为历史学家而进行过培训，他们的个人叙述比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给予我的亲临感总是要好得多，而无论那些基于研究的历史或作品写得多么好、词藻多么华丽。

撰写这一完整的故事——这近七年中的日子里发生的所有事件——还须等到将来，而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尽快地把这七年的岁月中展现在一个参与者眼前的最重要的部分记录下来。

对这些在个人回忆的线索上排列起来的重大事件的历史进行撰写的过程，使我再次想到我应该感谢那些我有幸与之一块共同工作过的具有杰出才华和勇于献身的人们。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自由的忠诚是一种凝聚力，而这种力量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才华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首先是里根总统。他的领导方略、政治勇气及政治远见使美国人民能够对只有伴随着军事实力（武器的裁减与稳定的增长）而得到的利益进行保护。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就更大了，因为他出于信心和信任给了我与他共享这段历史的无与伦比的机会。

我也必须在此感谢许多其他的人：威尔·塔夫脱，在联邦政府任职的岁月里，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协调，他使我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曾默默地工作，而他所创造的巨大价值只是到现在才渐渐被人们所认识。弗兰克·卡卢奇，我们几乎在各种职位上都长期地在一起工作；他在所有这些职位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忠诚、技能和效果。

戈林·鲍威尔上将、卡尔·史密斯中将及戈登·福内尔中将是我的高级军事助手，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使我有可

实现我所能做的事情。他们都是很好的军官，并且的确是由于他们非常胜任工作才受到任命的。他们继在我身边任职后又接受了负有巨大责任的其他委派，并且正如他们以往所干的那样——取得了真正的、杰出的成绩。我认识最久的是戈林。自从他于1970年获得“白宫伙伴”这一崇高奖励起我便认识了他，而当时我在联邦预算及管理局任职。戈林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美国最高军事职务，使我们的行政事务和国家所取得的成效达到了无法衡量的地步。在我的其他优秀的军事助手中，与我一起工作而令我感到骄傲的还有唐·琼斯海军上将和海军陆战队里奇·希金斯中校。里奇渴望从事一切工作，并于1988年2月作为非武装的联合国联络团的团长到黎巴嫩担任了对贝鲁特地区的个人观察使命。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被一些发狂的派别扣押为人质，那些扣押者后来用他们惯用的野蛮手段将他杀害了。里奇·希金斯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他的死是我们的巨大损失一样。

其他许多人也值得特别一提：里奇·阿米塔奇，他对亚洲、中东及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了解，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同那些至关重大的国家的关系，增进了同他们的友谊。

里查德·珀尔及他后来的代表弗兰克·加夫尼在武器控制和武器裁减方面具有足够的知识使他们明白传统的观念是何等的错误。尽管我们有时偶尔在政策上有点分歧，但他们却特别具有帮助作用。

并且，如果不对我的行政助手凯·莱什在其工作中的专长、耐心、外交技巧及判断力进行感谢的话，那么，任何有关国防部的叙述都将会是不全面的。她是1980年在卡特与里根政府的过渡期间加入我们的，并且目前仍在处理我所有的日常事务、旅行、书信及演讲。更不用说，她认识所有的将军、部长和外交官。可

以公正地说，没有她的杰出贡献，我们的工作便不能够完成得如此出色。

我也想对约翰·邓肯在各种演讲及本书方面进行的具有高价值的工作表示感谢。多少年来，总的说他给予了我良好的帮助。

我感谢伊娃·斯潘塞以及卡罗尔·埃尔德里奇、文森特·舒勒、索科罗·比达内斯对该书书稿进行的良好打字工作。

很多其他人员，其中包括西尔马·斯塔布斯·史密斯——正象她曾经为其他国防部长所工作的那样，也曾忠实地、勤奋地、愉快地为我进行工作；乔·蔡斯和比尔·布朗——他们运用绝技在国内外对我进行了保护工作。

还有少数人，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以及对我持续不断的鼓励是颇有作用的并令我深感欣赏。他们会知道我指的是他们，并且，我想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谢意的话，他们会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谢意的。

数百万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官兵，我对他们具有一种很深的亲缘感和甚至更深的钦佩感和责任感。杰克·维西上将最初跟我一样是个步兵，后来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体现出美国军事的精华。在他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我们密切合作，工作十分协调，所以我对他极为钦佩。他的继承者威廉姆·克劳海军上将是又一名优秀军官，在他的整个任职期间，我与其合作的非常好。我也感谢成千上万的娴熟地支持过和帮助过我们的公民，以及那些常常拆穿以攻击“官僚”为乐的无知者的虚伪的人。

然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简。当我们在陆军服役时，她一开始就已经在那里了；当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议员时，她又在一开始就参加了进来；她所给予的持续不断的支持和鼓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她是我们都应该有的勇气的榜样。谨将此书敬献给她。

引 言

这一历史对我来说始于1980年11月的一天，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突然来电话让我出任国防部长。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讲，这一历史是在此许多年之前开始的。那时，我父亲逐步培养出了我对历史及政治的潜在兴趣。他利用睡觉前的时间给我们兄弟二人讲述他自己编织的故事——宪法草案和最终导致了我们的国家得以形成的制宪会议中的各种争论和协定。可以说，这一故事讲了好几个星期，非常激动人心、引人入胜，以至于我们每个晚上都渴望倾听接下来的内容。如果把制宪会议成员是如何制定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权威结构这一故事的激动人心的感觉告诉一个不满13岁的孩子，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父亲既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又是个非常善于理解人并给人印象深刻的父辈，正像我母亲一样。我母亲是个具有杰出才华的小提琴手，但她却乐意放弃她的事业，因为她觉得她最合适的角色是利用所有时间与孩子们呆在一起。她这样做了，并且也正是从她那里我对音乐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在我看来，我父亲总是对政治和政府怀有极大的兴趣。我想，这可能是始于他在科罗拉多大学校园政治中所表现出的活跃角色。并且，这种兴趣自他于1910年从法律学校毕业后的那一夏天

变得更加强烈了。那时，他在科罗拉多州议会当办事员。

我父亲持续不断地培养并支持我对政治和政府的早期兴趣。当我才7岁时，他便鼓励我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半导体收音机中来了了解1924年于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进程。这一使民主党成员需要102张票才能通过一项任命的大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到我上中学时，这一基本的兴趣不仅没有停下来，反倒受到1933年出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的进一步的刺激。此时，我想了解政治和政府的那种激情和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当然，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1932年的那场竞选，并保存了有关那一年两党代表大会的剪贴簿。我是赫伯特·胡佛的坚定的支持者。他看起来并不像个能唤起中学二年级学生的激情的人，但我却一直钦佩他并对他颇感兴趣。

11岁那年，我父亲带我去参加于1928年竞选期间在旧金山一家饭店为胡佛举行的一个招待会。1932年选举的那天，在他经历了长久而又未获成功的重新竞选之后，我又和数百名中学生一起前往旧金山市政大厅向他表示致意。我永远忘不了胡佛从旧金山市政大厅的一页窗门走到凉台上时那种显得极为疲惫和彻底失望的表情。他当时站在林肯塑像上方的凉台上，向我们这些被带来看望美国总统的中学生招手致意。当竞选结束及人们当天上午已投完票时（我和我父亲一起来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遮盖起来的投票箱前，并见他投了胡佛一票），人们认为让没有党派倾向性的中学的孩子们去看望他们的总统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在家里，我们接着从收音机中收听了1932年选举情况的转播。1928年选举时我们也曾这样做过。前后两次选举的比较是明显的。1928年那次选举，晚上的电台播音现场是当选总统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的家中，有各种学生团体在为他奏唱小夜曲，还有一般

的欢庆气氛。有个学生通过写一个与欢庆关系不大的条子给电台，说我们为胡佛当选感到高兴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信他肯定会让斯坦福大学校长雷·莱曼·威尔伯进入内阁。后来，情况确实如此。然而，1932年的转播则完全不同。当我看到政府、政治家和国家的命运会变化得如此迅速时，我又上了一堂很有价值的课。

罗斯福就职后不久，“新政”就开始认真执行起来了。报纸上登满了有关的参考文章，但这些文章却使我感到迷惑，因为它们对“新政”的介绍是不完整的。我感到无法仅仅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新政”的全貌。所以，我便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议员写信，让他给我寄“国会记录”。这份资料按时寄来了（正常时间是发出后约7到8天），我不倦地进行阅读，甚至包括从资料中引申出来的一些评语。这意味着这些资料从未发表过。

通过这些资料，我对国会程序变得非常熟悉了，也对立法事项创制的性质有了相当的了解。大部分的立法事项都令我感到忧虑。我认为，这是效仿其他国家的体制，以试图为个人行为规定详细的方案和严格的规则，而这种规则将从根本上威胁到我们国家实行个人自由的机会——这种机会创造了如此多的新工业并为如此多的人带来了这样高的生活水平。我读过亚当·史密斯的一些东西，并从总体上同意自由经济的理论。我也曾参加胡佛1932年的选举，并喜欢他对自由经济的严重依靠。我觉得国家曾像过去那样已大大地、迅速地繁荣和进步，这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认为，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是靠这样一种制度而获得的——这种制度允许个人选择其自身的道路或阶梯，以便人人都靠自己的能力而尽好、尽快地去攀登，只要他不干涉或侵害他人。

我明白或者我认为我明白导致或真正引起1933年我们所面对的经济萧条的国际因素。但是，我感到自信的是我们能够等待许多可以使这一萧条减退的条件来走出这一萧条，而不是靠接受新政府每天都在采取的强有力的（及公认的更激动人心的）行动。然而，关于这些，可能在今后的著述中我将讲得更多一些，因为在这一历史当中，我打算集中谈一谈美国政府在1981年至1987年之间为改善和保证我们自己以及盟国的安全状况所采取的一些主要行动。我在这里提起我对孩提时代的回忆，仅仅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实际上一直对政府和政治事务有着强烈的、浓厚的、持续不断的兴趣。

1934年，我进入了哈佛大学。第一年我花了大部分时间拼命努力，最后，为了通过哈佛对它的毕业生提出的外语要求而开设的课程（令我永远遗憾的是，我的外语一直不太好），我主要参加了政府和英语史的课程的学习。我继续相信并阐明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和自由经济理论，并说明——正如我所认识的那样——集体经济、中央经济、计划经济的危险。在那一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成了当时被称为保守派的或多或少的发言人，针对当天的重大事件进行反“新政”的辩论。我记得阿瑟·霍尔库姆教授（政府主要咨询人员之一）有时会在课堂上将讨论停下来5分钟，最后说“还是听听我们的保守派有什么要说的吧”，然后便点叫我的名字。

我的许多观点也在哈佛大学的《克里姆森》报的社论中得到了表达，我在该报花去了我上大学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森》是一份保持独立的校报。我现在认为，我当时在该报的工作对我学会表达我对国内外事务的看法——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我经常这样做是为了使同学们从中取